

走向数字时代的人文学者：泛 LIS 视域下的进展与反思^{*}

肖 鹏¹ 姚楚晖²

(1.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2.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目的/意义] 在当前的 LIS 领域中, 以“人”为基点的研究尤为重要, 如何更好地为人文学者服务, 进而帮助他们实现数字转型, 是 LIS 领域涉足数字人文研究的要旨之所在。[方法/过程] 文章采用文献调研法, 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人文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选择性的梳理和分析。作者主要探讨了人文学者在信息资源需求和利用方面的变化、在数字工具需求和利用方面的变化, 以及由资源和工具所导致的人文研究过程的变化。[结果/结论] 初步总结了人文学者面临的数字挑战, 并提出 LIS 领域的数字人文研究应该在破除“数字技术是人文的必然救赎”这一固有偏见的前提下重新起航。

关键词: 人文学者 数字人文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 (LIS)

分类号: G250

DOI: 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19.03.02

0 引言：从“人”的基点切入数字人文研究

关于“人文学者如何做研究”这个议题,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经典的表述。让人惊讶的是, 直到今天, 这些表述还具有相当的洞察力, 譬如在古老的“韦编三绝”“皓首穷经”等成语中, 仍可窥见千百年来人文学者对经典文本反复细读的习惯。然而, 进入 21 世纪以后, 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 上述许多经典的表述也开始遭遇挑战。

经典表述的持久生命力, 隐喻着人文研究的独有逻辑和范式, 它们与 19 世纪以来诞生的现代科学截然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 以 Stone 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者尝试从信息行为的角度揭示这种逻辑与范式^[1]。这批描述性研究最重要的结论之一, 便是发现人文学者与纸质文本之间有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技术赋能视阈下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及其图书馆服务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8CTQ006) 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肖鹏 (ORCID:0000-0002-6668-8122), 男,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数字人文、图书与图书馆史, E-mail: xiaop25@mail.sysu.edu.cn; 姚楚晖 (ORCID: 0000-0002-4080-2943), 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信息行为, Email:yaochh5@mail2.sysu.edu.cn。

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结论曾被多项研究不厌其烦地重证、重申, 尽管其阐释的角度和案例有着很大的不同。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 这些看似坚实的基本结论开始被动摇。数字文化悄然改变了人文研究传统——对于置身其中的人文学者而言, 新兴的数字浪潮让他们既兴奋又焦虑^[2]; 而对于服务人文学者的信息专家与图书馆员来讲, 则迫切需要重新刻画和理解人文学者的研究行为与学术特征, 使这些“兴奋”与“焦虑”转化为持久的学术动力。

在当前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S)领域中, 以“人”为基点的研究尤为重要。如何更好地为人文学者服务, 进而帮助他们实现数字转型, 是这个学科涉足数字人文研究的要旨所在。在早前的一篇文章中, 立足中国第一个数字人文栏目的编辑经验, 笔者提出了推动数字人文从期待膨胀期转入成熟期的四个关键原则:(1) 数字人文应以“人文”为中心;(2) 关注“数字”与“非数字”的平衡;(3) 强调问题意识与数据意识的深度融合;(4) 推动人文领域数据基础的开放性、可验证性与可迭代性^[3]。这四个原则(尤其是第一原则)的提出, 已经暗含对数字人文尤其是图情领域数字人文研究的基本看法。

基于以上逻辑, 当我们把视野聚焦到人文学者身上时, 首先应该关注的问题便是: 人文学者究竟是如何与数字学术环境进行互动、实现交融, 乃至彼此影响的? 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触碰这种互动、交融和影响的本质, LIS 领域才有可能把握面向人文学者的图书馆服务和信息系统设计的“痛点”, 切入我们熟悉和热衷的服务、组织与加工领域。

在探索以上问题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对人文学者学术行为的研究一般有两种理路: 一是从人文学者的“自画像”入手, 二则是借由其他学科的视域加以观照, 两者相辅相成。来自人文学者的“自画像”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我解剖, 其话语多从个人的学术经验出发, 看似决断, 却可视作来自于“用户”的主观体悟。例如, 就人文学科的“孤独性”来讲, 人文学者往往如此描述: “人文学科具有以下诸方面的特质……有价值的思想基本上源于学者个人的‘孤独思考’。有史以来, 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独立特行的, ‘团队’和‘工程’对思想发明毫无用处”^[4]。而来自其他学科的观察是“由外而内”的, 例如 LIS 领域对“孤独性”的研究, 多会从引文研究或信息行为入手, 着力描绘人文学者在信息检索、引文习惯或文献使用中的相应特征^[5], 进而勾勒他们茕茕孑立的学术剪影。在这两种理路的取舍中, 本文更倾向从图书馆情报学和相关领域(统称“泛 LIS”)出发, 但其立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参考了人文学者的自我审视。

本文并不旨在完成一项严谨的文献综述工作, 而是试图裁选部分关键性的文本加以讨论, 以呈现人文学者走向数字时代的身影以及他们在这一路途中遭遇的数字挑战。具体来讲, 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 人文学者在信息资源需求和利用方面的变化, 在数字工具需求和利用方面的变化, 以及由资源和工具所导致的人文研究过程的变化等。

1 信息资源的需求和利用

对于任何研究而言, 信息资源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 但相比自然科学方面, 信息资源在人文研究中无疑处在更中心的位置。Ellis 和 Oldman 的调查发现, 英文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研究特别依赖于大量的文献阅读^[6]——这一结论在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大致也是成立的。与这种阅读习

惯相伴的，是人文学者对信息源和阅读素材的特殊偏好，尤其是对图书资源和一手文献的重视。

一般认为，人文学者最常用的信息源是图书。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之前，通过问卷、访谈式等调查方式，人文学者对图书的偏好已为学界和业界所熟悉^[1]。作为人文学者的关键信息源，图书不仅仅在他们的阅读中占据关键位置，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探索与创新——对人文研究文本的引文分析一度非常盛行，这些研究普遍发现，人文学者最喜欢引用图书，其次为文章，位列其后的一般包括百科全书、手稿、学位论文等^{[7][8]}。人文学者另外一个信息使用特征是对一手文献的重视。虽然二手资料也被用于事实性陈述^[9]，但原始文献在人文工作中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10]。

尽管很多研究多基于欧美语境，但上述两个结论似乎并不因地域的变化而不同，近年有学者对中文世界进行研究后也有类似的发现。例如，一项针对台湾中文系教师的研究就指出，受调查者尤为重视原始文献，特别是古籍原典，认为它们是中国文学领域教研最核心的信息资源^[11]。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研究在提及“图书”“一手文献”等信息资源时，几乎必然地将它们等同于“纸质文献”。长久以来，数字资源在人文领域都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直到最近十几年还有不少研究表明，数字学术资源在人文研究中扮演的是“补充文献”的角色。Rimmer 和 Warwick 等人的调查对“不信任”的根源展开了讨论：人文领域的数字信息资源存在多种问题，包括电子书资源价格昂贵、开放性差、图像质量差、权威性不足、交互体验差等^[12]。其实，人文学者对数字资源的这些诉求并不特殊，数字信息资源的高质量、可信度和易用性是用户们普遍的需要^[13]，但正如上文所述，人文研究往往决胜于特定的原典和核心文本，因此相比其他领域，人文学者对数字信息资源的缺陷更难容忍。

但这种情况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成熟正在发生变化，人文学者对数字信息资源的信任程度和利用程度在稳步加深。有研究指出，由于近年来全球各地卓有成效的档案数字化工程，历史学者日益认同图书和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对数字档案的使用频率也在提高^[14]。与此同时，数字利用的使用习惯与他们对图书、一手史料的使用习惯正逐步发生融合，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不少人文学者开始在档案工作中使用移动设备生产和阅读数字信息资源^[15]。

在纸本时代，对图书与一手资料的重视使得人文学者非常依赖图书馆、档案馆等相关机构，有很多研究都强调：图书馆就是人文学者的实验室。而在数字时代，有证据显示，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研究中心及它们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仍是人文学者最重要的信息源头^[16]。

2 数字工具的需求和利用

数字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也使得人文学者的工具环境发生变化。很多研究表明，数字工具已广泛地运用于人文研究的多个阶段之中，他们会利用数字工具（包括各类型的软件、硬件等）获取数据、分析数据、撰写论文和展示成果^[17]。

有不少研究对人文学者的工具使用及偏好进行了调查，一些最经常被提及的工具包括：文本图像捕捉对比工具、文件格式转换工具、OCR文字识别工具、数据分析及模式识别工具、文件管理及存储分享工具、元数据自动捕捉工具、笔记工具等等^[15]。有调查发现，文字处理软件（比如 Word）、引文管理软件（如 Endnote）等最受欢迎^[15]；而在相对复杂和高层次的工具序列

中, 文本分析工具和可视化软件比较受关注^[18]。

在工具使用偏好的基础上, 学界进一步对更底层的人文学者工具功能需求展开了分析。Toms 和 Flora 提出, 数字工具需要涵盖获取原始文献、文本表现、文本分析、获取二手资料、沟通交流等五个功能^[19]。类似的功能分析和需求梳理还有不少, 它们多参考了“学术基砖”(Scholarly primitives)^[20](也有学者翻译为“学术原语”^[21])之类的模型。

通过一系列相关考察, 泛 LIS 领域的研究者们针对现有工具提出了若干改进和发展思路, 其中最常见的两个方向是:(1) 定制化设计。需要专门考虑人文学者的需求进行工具设计, 尤其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层次标引^[13]; (2) 可用性、易用性问题。一般强调提供更多、更易操作的功能, 以便人文学者灵活、有效地使用工具^[17], 或者注意用户界面的优化^[22], 等等。

3 人文学者的研究过程

信息资源与学术工具的改变很可能影响人文学者的研究过程和研究行为。传统上, 人文学者的研究过程主要包括文献收集、文献阅览、信息整理、论文写作等, 很多研究者尝试通过规范的调查刻画、描绘并抽象和重构这些过程, 以建立相应的研究行为模型, 其中, Chu 围绕文学评论行为建立的五阶段模型^[23]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针对研究过程的研究对后续的工具开发具有启发性价值, 某种程度上也是“学术基砖”等理论的滥觞。

目前的数字化进程或许还不至于彻底改变人文学者的研究过程, 但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非常明显。在传统的人文研究中, 文献收集是处于核心地位的, 论文写作有时候甚至被认为是“末节”, 而在新的时代, 冷僻资料的占有越来越难, “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 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或数年光阴, 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能得以解决的问题, 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或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因此, 数字化时代人文学者的功力, 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4]。当然, 这绝不意味着资料积累或一手资料的阅读不再重要, 只不过从研究过程的视角来看, 文献收集、信息整理的时间占比会相应下降, 人文学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分配到阅览、分析与写作方面。

数字化对传统人文研究过程影响最大的环节或许是学术交流与合作。21 世纪以前的很多研究都表明, 虽然计算机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文学者的研究方法, 但是他们仍倾向于独立研究, 很少展开合作^[1]。甚至在 2010 年前后的一项调查还显示, 有将近一半的学者独自进行学术研究, 大多数人从没有和同事(55%)或者研究生(64%)合作过, 87%的人不会在研究结束之前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情况^[13]。因此, 正如本文开篇时所论及的, 人文学者总被认为是“孤独的思考者”——尽管他们同样热衷于学术争鸣与批判, 也经常参加学术会议获取新想法^[23], 但传统上他们确实不习惯学术合作, 甚至很少向图书馆员寻求帮助^[24], 而数字化的发展促使这种情况发生变化。2010 年的一项研究称, 电子邮件已成为人文学者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 他们开始乐于使用电子邮件联系专家学者进行访谈、调查, 甚至开展合作等^[25]。Ellis 和 Oldman 认为, 电子邮件大大降低了学者进行学术合作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6], 促使“孤独的思考者”们日益紧凑地聚拢在一起。除了电子邮件之外, 诸如虚拟研究环境技术(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s, VRE) 以及其他数字科研技术也促进了学者之间的远程协作^[26]。

数字化对人文学者方法论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传统的人文研究并不拒绝定量研究, 历史研究中甚至有“计量史学”这一流派, 但数字技术的介入显然进一步促进了定量及其他新兴方法在人文学科的发展。仅就中国现有状况来讲, 许多机构和人文学者已开始利用数字技术展开量化和可视化实践, 典型者如中华书局以龚延明教授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为基础, 建立“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 对科举世界进行了量化重构; 而浙江大学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则是可视化方式的应用典范, 对传统研究中空间维度之缺失做了很好的补充^[28]。

4 人文学者面临的数字挑战

信息资源、数字工具的改变, 以及它们所引致的人文研究过程和方法论的变化还将持续发生, 延续数百年的“韦编三绝”“皓首穷经”等成语或许将在短时间内成为真正的过去时。并不是所有人文学者都能安然接受这样迅猛的改变, 从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 人文学者面临的数字挑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数字观念的艰难转变

虽然数字技术的使用为人文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但人文科学本身具有一定的“反机器”内在传统和特征, 许多学者对数字技术仍持怀疑态度^[1]。为数不少的人文学者对数字技术应用于学术工作的接受程度不高, 数字观念转变艰难。

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有研究者访问了若干文学学者, 发现很多受访者不信任数字出版的资源。尽管受访者们也会使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交流或学术合作, 但他们更重视实体文献资源, 对于数字图书馆及虚拟图书馆持消极甚至排斥的态度^[6]。当然, 几年后的另一项调查则称, 被调查者对于数字信息资源的看法是积极的, 但是不同年龄、性别的人文学者情况各有不同, 较年长的学者更不容易接受新技术, 更倾向于使用纸质资源, 此外, 男性学者比女性学者更容易接受数字资源^[25]。这些研究的结论众说纷纭, 但几乎所有研究都认同, 人文学者对数字观念和数字技术的接受不会如其他学科那么迅速。

4.2 数字技术的使用障碍

除了观念问题之外, 不少研究还发现, 人文学者在应用数字技术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短板, 由于缺少充分的技术支持, 他们往往无法真正发挥数字工具的价值^[29]。更严峻的问题是, 数字技术使用障碍可能反过来导致观念障碍, 将人文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引入恶性循环。

最典型的障碍之一是信息素养与检索能力不足。Rose发现, 艺术史学者在使用通用搜索引擎的过程中常常无法获取真正需要的信息^[30]。素养和能力不足与图书馆的核心使命息息相关, 但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有访谈发现, 部分人文学者因为年纪较大或事务繁忙, 难以“接近”信息技术, 有人表示“图书馆有很多数据库, 但我只使用过很少一部分,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并学习它们”^[25]。“没有足够时间”的背后, 或许是业务繁忙, 或许是重视程度不足, 或许是遭遇能力提升瓶颈, 但无论哪一个, 都要求图书馆、档案馆进一步走近人文学者, 提供更为深入的服务。

4.3 数字世界的现有缺陷

和纸本文献动辄千年的历史相比起来, 数字技术仍处于萌芽期, 数字资源和工具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缺陷。例如, 数字文献常常不能完整地反映原件的原貌、阅读体验差, 有时候甚至存在版权问题等^[12]; 人文学者普遍认为, 数字阅读不如纸质阅读舒适、快速, 做笔记也不如纸质图书便捷^[31]; 进一步地, 与纸质文献相比, 目前的数字文献浏览功能较弱, 无法提供相关文献之间的空间联系^[12], 特别不利于人文学者通过书架浏览实现文献偶遇^[6]——这种“偶遇”被认为是人文研究中发现新颖学术课题的重要手段。类似的缺陷包括数字档案检索系统存在检索效率低、浏览及导航功能不足、检索界面不友好、数字图片质量低、检索文献费时费力^[14]等等。

如果说上述工具层面的问题迟早会在技术迭代中得到解决, 那么, 数字世界中一些更宏大的困境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 Kostova 就认为, 人文学者当前面临的绝非资源匮乏, 而是大量的信息过剩和信息爆炸^[32]。由于信息太多, 很多学者担心无法随时追踪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由此引发了焦虑情绪^[33]。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技术问题, 需要以跨学科的视域、以多种渠道探寻解决方案。

5 结语

本文有选择地对泛 LIS 视域下针对人文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人文学者奠定了基础, 但现有的研究局限十分明显, 例如, 在研究方法方面, 以定性研究为主, 研究样本都比较小, 大多数学者仅调查了特定领域人文学者的信息需求及信息行为。有一项经典研究的调查对象只有 20 人, 包括 15 名教师和 5 名研究生, 受调查者研究领域集中于英语学科 (11 人), 剩下的调查对象分散于数字人文、语言学、文学等多个领域^[17]。

但是, 方法论层面的局限并非现有研究的最大弊端。现有研究的最大问题是, 它们往往必然地将“传统”的人文学者视为需要拯救的对象, 在这一逻辑下, 很多研究的出发点是将“传统的”人文学者转化为“数字的”人文学者, 将“传统的”人文学科转化为“数字的”人文学科。但这一出发点是否正确值得慎重对待。当前我们往往粗暴地判定数字人文将拯救人文学科, 这是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经验而来的, 但正如 Heuser 和 Le-Khac 曾质疑的: “在高举跨学科研究旗帜的情况下, 数字人文是否只是自然科学的殖民地?”^[2]

或许, 只有破除“数字技术是人文的必然救赎”这一偏见之后, LIS 领域的数字人文研究才能够迎来新生。至少就目前来看, 人文学者们希望传统文献与数字资源能够相互结合, 而不是简单地让后者取代前者^[2]。帮助人文学者灵活地在纸质文献与数字资源之间保持平衡, 充分从复合环境中受益, 平稳地通往数字时代, 才是未来相关研究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STONE S. Humanities scholars: information needs and use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82, 38(4):292-313.
- [2] HEUSER R, LE-KHAC L. Learning to read data: bringing out the humanistic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J]. Victorian Studies, 2011, 54(1):79-86.
- [3] 刘洪, 肖鹏. “期待膨胀期”的数字人文研究——《图书馆论坛》“数字人文”栏目的回望与展望 [J].

图书馆论坛, 2019, 39(1):40-45.

[4] 陈春声. 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 [J]. 开放时代, 2009(5):46-53.

[5] BARRETT A. The information-seeking habits of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ers in the humanities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05, 31(4):324-331.

[6] ELLIS D, OLDMAN H. The English literature researcher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5, 31(1):29-36.

[7] STERN 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terature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J]. College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83, 44(4):199-209.

[8] CULLARS J.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nographic literatur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1985, 46(6):511-522.

[9] BUDD J. Characteristics of written scholarship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 citation study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86, 8(2):189-211.

[10] WIBERLEY S, JONES W. Patterns of information seeking in the humanities [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1989, 50(6):38-45.

[11] 邱子恒. 中文系教师信息行为之研究: 以辅仁大学为例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 37(2):61-74.

[12] RIMMER J, WARWICK C, BLANDFORD A, et al. An examination of the physical and the digital qualities of humanities research [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2008, 44(3):1374-1392.

[13] TOMS E, O'BRIEN H. Understand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needs of the e-humanist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8, 64(1):102-130.

[14] SINN D, SOARES N. Historians' use of digital archival collections: the web,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nd archival research [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65(9):1794-1809.

[15] TRACE C, KARADKAR U.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the humanities: scholarly processes, too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collections [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68(2):491-507.

[16] WARWICK C, TERRAS M, GALINA I, et 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users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the humanities [J]. Program: electron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008, 42(1):5-27.

[17] GIVEN L, WILLSON 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scholar: documenting digital research practices [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69(6):807-819.

[18] 冯向梅. 人文社科学者用户对学术型产品使用行为的实证分析 [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17(1):61-66.

[19] TOMS E, FLORA N. From physical to digital humanities library—designing the humanities scholar's workbench [M] // SIEMENS R, MOORMAN D. Mind technologies: humanities computing and the Canadian academic community.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06: 91-115.

[20] UNSWORTH J. Scholarly Primitives: what methods do humanities researchers have in common, and how might our tools reflect this? [C] // Symposium on Humanities Computing: Formal Methods, Experimental Practice, 2000.

[21] 刘炜, 叶鹰. 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5):32-41.

[22] GIBBS F, OWENS T. Building better digital humanities tools: toward broader audiences and user-centered designs [J]. Forthcoming in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2012, 6(2):136-149.

[23] CHU C. Literary critics at work and their information needs: a research-phases model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99, 21(2):247-273.

[24] TAHIR M, MAHMOOD K, SHAFIQUE F. How humanists use libraries: a surve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faculty at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 Pakistan [J]. Library Review, 2009, 58(8):581-592.

肖鹏, 姚楚晖. 走向数字时代的人文学者: 泛 LIS 视域下的进展与反思 [J]. 文献与数据学报, 2019, 1(3): 018-025.

[25] GE X.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in the digital age: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academic researchers [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2010, 71(5): 435-455.

[26] FLOR G, JIROTKA M, LUFF P, et al. Transforming scholarly practice: embedding technological interventions to support the collaborative analysis of ancient texts [J].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2010, 19(3-4): 309-334.

[27] 龚延明. 《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怎么来的 [N]. 中华读书报, 2019-5-29(6).

[28] 学术地图发布平台 [EB/OL]. [2019-6-2]. <http://amap.zju.edu.cn/>.

[29] 朱本军, 聂华. 数字人文: 图书馆实践的新方向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7, 35(4):23-29.

[30] ROSE T. Technology's impact on th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art historians [J]. Art Documentation, 2002, 21(2):35-42.

[31] KACHALUBA S, BRADY J, CRITTEN J. Developing humanities coll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exploring humanities faculty engagement with electronic and print resources [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2014,75(1):91-108.

[32] 张小溪. 数字技术介入人文研究成趋势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05-30.

[33] RIEGER O. Humanities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al age: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2010.

Humanities in the Digital Age: Progress and Refle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S and Relevant Fields

XIAO Peng¹ YAO Chuhui²

(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today,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r” in the research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ere are some critical issues for LIS researchers: how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to humanities scholars? How to help them achie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selective literature review, the authors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humanities scholars.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hanges in the needs for and the us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digital tool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the humanities research processes influenced by digital resources and tools. [**Result/conclusion**] The paper preliminarily summarizes the digital challenges faced by humanities scholars and suggests tha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in the LIS field should be re-started on the premise of breaking the preconception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s the natural redemption of the humanities”.

Keywords: Humanities scholars; Digital humaniti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本文责编: 周 霞)